

60. 99

常熟文史資料集



— 1 — 3

# 常州文史资料

##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常州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1983.6

## 目 录

常州纺织工业史话	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办	( 1 )
民国初年本邑布厂概况		( 41 )
我国早期农村电力灌溉区 ——武进县蒋湾桥、吉三垛二处电灌站	吴之光	( 44 )
我所知道的常州钱庄业	查秉初	( 49 )
建国前的常州典当业	朱康孙	( 56 )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常州分行的经营管理		
	唐汉圣 唐哲如	( 80 )
前北岸居民惨杀案始末	陈吉龙	( 89 )
大成一、二、三厂遭受日寇破坏损失概况	孙启仁	( 94 )
一九三七年日寇蹂躏后的通成棉毛织厂	李安之	( 97 )
沦陷期间民丰纱厂的悲惨遭遇	江上煜 黄晓勤	( 99 )
查秉初先生二、三事	李镇瀛	( 101 )
在陈诚家任家庭教师的日子里	朱兆京	( 107 )
重建太平兴国寺塔记碑文	陆鼎翰撰 庄赓良书	( 112 )
庄赓良和他的书法	义元	( 116 )
刘君脊生传	吕思勉	( 119 )
屠寄行略	佚名	( 121 )
常州清真寺简史	赵华宇	( 126 )

- 正德学社述略 ..... [徐 赛] (137)  
回忆武进县立师范 ..... 陈九畴 (143)  
武进民众教育馆和平民教育琐记  
..... 苏鸿铨口述 尔东整理 (147)  
常州贫儿院片断 ..... 骆振华 (151)
- 读者·作者·编者 ..... (154)  
方子华对《京剧票界史话》的几点质疑  
石人、邵因的答复

# 常州纺织工业史话

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办

常州纺织工业在本市各项工业中占主要地位，它从第一家布厂成立起，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

常州的纺织工业是在农村土布业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成长起来的。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手工业发展到机械化，从独织厂发展到纺、织、印、染，它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可以说它是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挣扎起来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道路是崎岖的，但是它的发展也给地方经济带来了一定繁荣。

解放以后，常州纺织工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已走上了康庄大道，形成了具有棉、毛、丝绸，化纤等多门类的，水平较高的工业体系，常州成为一个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

## 一、从农村土布业谈起

常州四乡在很多年以前就有了土布生产，最盛行的地区在城南湖塘桥、城东马杭桥一带，因为那里人多地少，农民习惯以养蚕、织布为主要副业。

土布最初是土纺土织，到清朝末年“洋纱”（机纺纱）进口以后，才逐渐用“洋纱”土织。织布机称“高机”，最早用的是“投梭机”，用双手投梭，劳动繁重，生产率低，布幅狭，质量差，俗称“小布”。以后改用“手拉机”，一种来自

江阴的改良布机。据说由华墅黄哲卿创造。“手拉机”只需用一手拉绳，就可使梭子往复，这就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功效。随着“手拉机”的推广，城市也出现了手工业布厂。一九二〇年间又有“脚踏机”传入，生产效率提高更多，几乎接近于动力织机。这是土布织机发展的三个过程。

土布的品种、规格，也随着织布机的发展逐步改进。如投梭机织的布既狭又短，品种虽有芝布、宣布、扣布、石门等不同，但门幅都只有八寸至一尺二寸，每匹布长也只有一丈八尺至二丈一尺。因为布幅狭，如果用来缝制被单，就得用五、六幅才能拼成，这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那就无法想象了。但当年常州年销这种小布多时可达七、八百万匹，价值银币四百万元以上。自从采用“手拉机”以后，土布的花式品种增加了，它可以织二尺以上门幅的斜纹布、峭岐格以及葡萄呢、皱纹呢、丝光线呢等花式布。“脚踏机”的问世，更使土布生产发生了一次重大改革，它的产品几乎与一般动力织机相仿。但一九一八年北京政府规定，凡是手工织布机生产的棉布统称土布。

农村土布由布商设庄收购，称为“布庄”。布庄大多设在产地市镇。交易采取“兑布”方式，即布庄以棉纱发交农民加工织布，收回后付给一定工缴。以后发展为纱布现货兑换，称为“现兑”，两种做法各有利弊，但都比现金交易为好，因为兑布可以省得农民再去买纱。现兑更可使布庄看货换货，不担风险，因而兑布方式一直被沿用到合作社成立以后。

因为土布是农村副业，生产有季节性，所以三春农闲，土布上市最多，有“清明布，好铺路”的俗谚。夏秋季节土布上市量就少，兑布工缴即根据土布的质量和季节旺淡而有浮动。

布庄把收购的土布成批运往城里，向布行或布号销售。布行属经纪商性质，收取一定佣金；行址大都设在西瀛里一带，

因近河，搬运便利。布行较大的有源大成、胡仁泰、谦泰昶等十余家。它们不仅经销本地土布，也收受江阴、无锡、常熟、嘉定以及浙江平湖、硖石等地的来布。因为常州有强大的印染力量，因此常州也是色布的主要集散地，外来客商络绎不绝。

布号又称色布号，以后也称绸布号，集中开设在城区中心和西门一带。其中有批发商、零售商，也有批零兼营的。布号买进白布，除以少量直接出售外，大部分发交染坊加工，制成色布。批发业务以外埠为主，如苏南的宜兴、溧阳，苏北的里下河一带，有些布号还远销皖南、皖北以及山东、浙江等地。为了招揽生意，一般都采用赊销方式。因此各布号也都雇佣名为“水客”<sup>①</sup>的专职人员，长年在外推销棉布，同时催收货款。

这些布庄、布行、布号，形成了当时土布的产销体系，它对发展土布生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到二十年代末，农村出现了棉布生产合作社，原来的产销体系，便开始逐步瓦解，布庄被合作社代替，布行也相继转业。

棉布合作组织，最初成立于湖塘邵舍村。后来逐步发展到马杭桥、周家巷、鸣凰等地。起初为自发的互助组，以后由政府倡导，正式成立棉布生产合作社。当时规模最大的为湖塘桥合作社，由杨挺葆主持。它的经营方式，是由社方供应棉纱，按一定规格发交社员加工，定期收兑，而后由合作社集中销售。农民参加合作社以后，比个体经营时任务稳定可靠，因此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布机也有所增加，在土布旺季季节，社员几乎夜以继日，“停人不停车”，故合作社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织布业的发展。到抗战爆发时，湖塘地区（包括马杭桥、鸣凰、周家巷一带）的脚踏机已发展到一万五千台左右，日产坯布和各类“厂布”约一万余匹（四十码匹）。

## 二、土印土染 古色古香

土法印染是随着土布生产发展起来的，因此当初城乡都有染坊，城区最初在北门一带较多，后来逐渐集中到南门浦前（丫叉浦）。因为那里接近土布产地，离城区亦不远，交通比较方便。

在旧时代，男的青衣蓝衫，女的穿红着绿，印花制品有头巾，包袱、被单、蚊帐等等，都出自手工印染。土法印染虽然花型简单，色泽古朴，但古色古香，深受大众欢迎。因此土法印染业也就逐渐发达。染坊可分为漂白、染色、印花、踹平等专业，也有几行兼营的，但统称为“印染业”。色布有红、黄、蓝、青、绿、元、灰等等。市上最热销的是元布、元斜、青布、青斜。所用染料，最初都是植物性的，如染砂绿的“绿柴”，染元色的“化果”（五倍子）和染青色的“靛青”等，这些染料都还可以就地取材，绿柴在浦前一带就有成片栽培。在化学染料进口以后，这些植物性染料才逐渐淘汰。

当年常州的印染力量相当强大，产品种类很多，砂绿布是常州的特色。但是最初的印花技术不如苏州，坯布都要送苏州加工，花布上还要加盖“苏印”两字以示名产。但后来有绍兴人来常州北门开了一家“三阳泰染坊”，有比较高明的印花技术，出品不亚于“苏印”，而且成本低，交货快，因此各布号开始就地加工；又因为苏州不产土布，常州的印花业也就很快取代了苏州。从此常州的土法印染也有了全面发展。到一九二八年，计有漂白坊、元色坊、砂绿坊、青蓝坊、灰绿坊、印花坊共二百三十三家；还有整理业的踹光坊三百余家，浆坪坊十二家，职工多至二千余人。这些印染坊大都设在浦前周围，因

此在镇上还成立了以“素绚公所”为名的同业公会。

土布印染业的发达，给浦前镇带来了经济繁荣。这个小镇在每年元宵节总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灯会，有龙灯、马灯和各种灯彩的提灯活动；还大放焰火，景象非常热闹，城乡附近居民，万人空巷，争往观看。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土法印染终于逐渐衰落，而为现代化印染所代替，浦前镇的繁荣也随之消失。今天人们还可以看到在浦前街角被抛弃的大“石元宝”，这就是当年被用来踹光的笨重工具，现在它已成了历史的见证人。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土法印染也和今天的印染工业一样，它是整个纺织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促进土布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也为后来的印染工业培养出一批熟练工人。

### 三、常州最早的两家布厂

手拉机的问世，提高了织布生产力，也为织布生产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清朝末年，常州便先后出现了两家手工业布厂。

一、常州的第一家织布厂名晋裕布厂，它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即清光绪三十二年。厂址在东下塘原江西会馆，创办人吴有孺。资本五千元，投资者有胡瑞麟、胡朗甫（后中途退出）。最初有手拉机百余台，厂房除借用会馆房屋外，还新建了车间、办公室二十多间。生产一种名叫“条布”的产品，这种条布因初见于宁波，故又称“宁条布”，北方又名“爱国布”。条布不同于一般色布，它是先染后织——这就是后来的布厂都称为“染织厂”的原因。土布规格也有了一定改进，条布阔二点二尺，长五丈，这是织布工艺上的一个进步，所以产品也大

为市场所欢迎。

晋裕布厂在开办时因为没有一点基础，所以除了普通工人外，主要靠一批江阴籍技工，还聘用了一位苏州工专毕业的技术人员顾志凌。他们不仅在生产上起了作用，还带出了一批本地工人。吴有儒去世后，由乃弟寄儒继续经营。一九一六年，又在灵官庙弄建立一个分厂，两处共有布机一百五十余台，业务更为发达。产品曾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览获得奖状。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吴出于爱国热情，又在城内织机坊口开设“振华国货公司”，专门经营国货，并首创货不二价，标出“一言堂”牌子。但因欧战结束，西方势力接踵而至，他的事业终于日趋衰落，以至无法维持。最后于一九二一年晋裕和振华两处终因被帝国主义挤垮同时宣告歇业。

二、略后于晋裕办出的是裕纶布厂。创办人蒋盘发，他原在马杭桥经营土布，看到晋裕布厂的创办，感到很有发展前途，但是由于他出身农家，力量不足，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设法与赵锦清、蒋鉴霖合作，集资一千五百元（每人投资五百元），创办了裕纶布厂，厂址在梅龙坝，这是常州开出的第二家手工业布厂。

裕纶开办时有手拉机三十台，因生产上缺乏经验，故开始时曾经常向晋裕学习观摩，但后来进步很快，产品由条布增加了条裕、丝光、什锦等几个品种。业务也迅速发展，除销本地、本省外，还远销汉口、华北，布机最后增加至二百八十八台，并经常以“美孚灯”（一种最挂式火油灯）为照明，增开夜班。这样经过五年的艰苦经营，至一九一五年结束时，获得净盈余达三万余元，即相当于二十倍的投资，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蒋盘发在裕纶成功的基础上，接着于一九一六年集资

九万元创办了大纶布厂。它的全称是“大纶机器织布厂”，厂址在东下塘现床单厂。这是从手工业厂脱颖而出的常州第一家动力布厂。

大纶的股东基本上仍是裕纶旧人，所以大纶实际上是裕纶的发展。蒋盘发自任经理，另外由他的金兰之交刘国钧参加投资，担任协理。经营动力布厂又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筹备期间，蒋曾专程由上海东华铁厂陈清鉴陪同去日本考察，同时买回旧布机“大英车”一百台和浆纱机一台，连同原裕纶的手拉机一百八十台，共有布机二百八十台。一年后又由陈清鉴介绍购进大英车十台，铁木混十台——这是铁木混最早被引进常州。因为这种简易动力布机造价低，又有相当于一般动力织机的效能，故以后为许多小型厂广泛采用。

由于机器设备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大纶布厂的产品已超出了 一般布厂的范围，开始以白色斜纹为主（阔二点二尺、长四十码，）因此它成为常州的第一家白织厂，业务也远远超过手工业厂。到一九一九年经营结束，获利达二十万元，它为进一步创办大纶纱厂奠定了基础。

四、裕纶结束时，除创设大纶布厂外，同时还成立了好几家布厂，如在裕纶原址（梅龙坝）有蒋吉昌办的振余布厂；在赵家村（梅龙坝前村）有赵锦清办的锦纶布厂，以及尉史桥（广化桥）的天泰、公信，小南门的广丰、汪永裕，天皇堂弄的天孙（即后来的第九工场），还有办在乡区的通惠。这些厂都还是手工业布厂，不过在设备和产品上也已经有了某些改进。如振余布厂，不仅有手拉机一百台，同时又采用脚踏机（最初又称“天津机”）八十台，并雇佣外地男工上车，这是常州使用脚踏机的第一家布厂。第九工场是一家官办厂，它在设备方面首先采用提花机，生产各种提花织品，常州之有木机提花是从

这个布厂开始的。以后便有公信等厂争相效法。公信由徐炜卿创办，他兼有布号，实力雄厚，这个厂除了有手拉机一百左右外，也添设了提花机四十三台，包括纸板提花机（花绫机）六台，木板提花机（独脚机）四十二台，其他如广丰、锦纶则仍单纯用手拉机，数量各八十台、六十台。

这批新办的布厂，最初经营都较顺利，但后来因欧战结束，洋布倾销，土布逐渐受到排挤，因而相继亏本。北京政府当时在张謇（季直）农商部总长任内，虽曾采取保护政策，连续两次实行土布免税（一九一八——一九二四），但都无济于事。加之工厂本身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或同业间互相倾轧，最后包括晋裕在内有八家布厂先后倒闭或改组。振余布厂蒋吉昌还在失败后纵火焚厂，企图诈取保险公司赔款，结果触犯了刑律，弄得家破人亡。

但是这一时期是常州纺织工业的萌芽期，失败是难免的。但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为后起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比如最初各厂不仅机修、穿综和漂染等技工来之不易，即一般织布熟练工也很难招收；因为在封建思想还很浓厚的年代里，妇女留厂过夜（开夜工）也会招致社会非议和家庭阻断，裕纶当初就曾遇到过许多麻烦。为了当地技工缺乏，晋裕、裕纶、振余等厂，都不得不以高价从外地招募（如江阴、南通等地）。但是以后这些厂陆续培养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在晋裕停歇时，有一批技工、熟练工都被恒丰布厂吸收而充实了这个新厂。

又如常州原来只能生产一般花色布（“厂布”），技术上落后于江阴、上海。从第九工场成立，引进了提花设备和技术以后，便有了提花布的生产。第九工场虽然只经营了三、四年（一九一八——一九二一）但是常州生产的提花贡呢（丝光线

来自上海）、毛葛（人造丝原料）以及各种花线呢等织品却从此崭露头角，也培养出了一批提花技术队伍。

再如脚踏机是最早在振余布厂使用的，但不久便为同业仿制。振余后来虽然失败了，它的布机却大批分散到农村——停歇时曾以布机抵付工资，最后代替了原有的手拉机而使城乡织布业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所有这些事例，都足以说明这些手工业布厂为整个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 四、棉纺创业话艰辛

大成、民丰（今国棉一、二厂）是常州最早的两家纱厂，它们同时成立于一九二一年冬，是一对孪生姐妹；而且在早期的历史上都有着类似的苦难遭遇。

1. 在两厂中以民丰发起较早，最初名“常州纱厂”。但在常州纱厂成立以前，已经有过“大经纱厂”的筹设（一九一八），后来因投资者少，未能成功，所以这次等于旧事重提。起因是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有署名章百渝<sup>②</sup>的在《武进月报》上连续刊登《纺织业之需要》、《爱国心与爱乡心》等文章，竭力鼓吹常州应设立纺织工厂，这才引起社会的重视，热心于地方事业者又重新发起组织。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正式召开常州纱厂发起人会议。参加者有卢锦堂、钱琳叔、于瑾怀、江上达和荣德生等人。会议决定集资六十万元，积极进行筹备。九月间于瑾怀在报上发表了《创办常州纱厂利益说明书》，大意是：

常州年销纱二万件，一向购自外地，而本县却无一家纱厂。常州素称文化之区，如此伟大事业，犹落后于锡、澄等地，这与常州之盛名是极不相称的。

“常州纱厂”已在筹建，在南门外大校场购地四十三亩；机器已订购英国好华特新纺机一万二千锭，怡和洋行拖平发电机一台。约期于七至十二月陆续交货，“合同纯用华文”。

这个纱厂的创办是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语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它是一定有前途的，也是有厚利可得的。

这个《说明书》目的虽然在于招股，但也反映了当事人的  
一片苦心和良好愿望。一九二〇年十月，公司举行创立会，选出董事卢锦堂、杨翼之、荣德生等六人，由钱琳叔任经理，于  
瑾怀、江上达任协理。在筹备期间，钱琳叔曾专程组织去南通等地参观，并写了一篇《赴南通参观地方建设报告》，文中详  
细介绍了张謇兴办地方事业的情况；同时呼吁我邑有身家人士，不要苟安于守护个人私产，购书画古玩自娱，应该起来多为  
地方事业出钱出力。<sup>③</sup>可以看出他对兴办地方事业的热情是很  
高的；但以后工厂的筹建过程并不顺利，原计划于一九二〇年  
年底开工，结果延至一九二一年十月才开出纱锭四千锭，但常  
州终于生产出了自己的第一批棉纱——十支仙女纱。工厂所以  
迟迟不能投产，主要原因是：（一）技术力量不足，专家仅有与  
荣德生合请的一位邓着先工程师；（二）管理人员和熟练工招  
收不足额；（三）订购的外国机器不按期交货；（四）外汇牌  
价高涨，又因增添设备，原资金已不敷应用。不过当时工厂负  
责人主观上还是非常积极的，在公司成立初期，为了培养企业  
技管人才，还招收了一批练习生派往上海宝成纱厂实习。招生  
采取择优录取方式，名额四十名，在应试的二百多人中，何乃  
扬也是其中之一，并以第一名优异成绩录取。

纱锭陆续开出后，原希望有良好销路，但是由于抗战结  
束，英日纱布充斥市场；外商并先后在上海开设纺织工厂，如  
英商的怡和、纶昌，日商的内外棉等；它们就地产销，使国内

纱厂受到重大压力。一九二三年春，常州纱厂终于因亏损停产，清理拖欠达二十二万元，与纱厂有往来的常州商业、富华两银行也同时宣告破产，这时离开工仅十六个月。

一九二五年六月，董事会决定把工厂租给申新，改名“申新第六厂”，订期五年；租金按利润分成，出租人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经理为荣鄂生。申新承租后，由于管理较有经验，又因纱价上涨，故获利逐年增加，至一九三〇年租约期满时，净盈达一百四十万元，常州纱厂因此也获得一笔较大的租金。

一九三一年春初，纱厂收回自营，资本总额为五十三万元，由江上达、杨翼之主持，这时开始改厂名为“民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但又因经理与股东间发生矛盾，迟至九月才恢复开工。自营以后，生产仍无起色；至一九三三年再度搁浅而与苏纶纱厂合作，总资本额增为七十万元。同时增添布机二百八十台，纱锭八千锭，改由严庆祥、李耀章主持，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

民丰纱厂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波三折，数度易手。

2.大成纱厂最早名“大纶纱厂”，筹建于一九二〇年。厂址在德安桥，与常州纱厂遥遥相对。它是蒋盈发在办理裕纶、大纶两布厂成功的基础上创建的。资本额为五十万元，实际并没有招足。有纱锭一万枚，布机二百六十台，以六百匹引擎为动力（当时戚电厂尚未成立）。董事长为刘叔裴，蒋任经理。作为一个主持人有一定的办厂经验，这是一个良好条件。在技术力量方面，他还罗致了原在晋裕的顾志凌和南通纺院出身的朱通生二位。开工以后，生产情况比较正常，但是不幸也遇到与常州纱厂同一不利环境：英日帝国主义采取倾销和“花贵纱贱”的手法压制华商，致使大纶也受到重大挫折。一九二二年，不得不求助于上海保大、久大两银号；又因蒋本人在棉花交

易中失利，终至造成企业严重困难，至一九二四年被迫停产清理，仅迟于常州纱厂一年。

一九二六年七月，大纶因无力偿还上海保大、久大银团借款，按规定企业由债权人处理抵偿。故以后即由银团接办，增资为七十五万元，改厂名为“大纶久记”，由嘉定人顾吉生任经理，杨学贵主持厂务。至此蒋盘发便被迫离开大纶，这对这位创办人来说是十分痛心的，据说以后他每次经过大纶，总是低头而过。

顾吉生经营“久记”以后，市场情况略有好转，但因为管理不善，工潮迭起（一九二七年十月常州成立“武进纱厂工会联合会”），生产不如申新六厂。一九三〇年初，顾对经营已感到十分棘手，有意把久记转让，正好此时刘国钧想经营纱厂，因此一拍即合，久记股东同意以五十万元出盘，于一九三〇年二月正式成交。大纶（久记）从此改名为“大成纺织染股分有限公司”。

新的公司成立，由刘国钧任经理，刘靖基任协理，二人珠联璧合，成效卓著。同年夏季全部开车，到年终竟获利十多万元。一九三一年继续悉心经营，情况更好，全年获利又达五十万元，这样刘在股东中信誉大振。一九三二年增加纱锭一万五千枚。同时将自己的广益厂并入，增添印染设备，改为大成二厂。至此大成已成为一个纺织印染联合企业。

以后经过进一步改善经营，企业发展比以前更速。一二两厂布机续有增加，最后达一千四百八十五台（一厂七百五十六，二厂七百二十九）。一九三六年又与汉口震寰纱厂合作，投资三十六万元（震寰以机器厂房作价二十四万元，合共六十万元）成立大成四厂。同时在东门兴建大成三厂，计划纱锭三万两千枚，布机一千零八台。到抗战时汉口四厂盈余达二

百万元，三厂则在常州沦陷后被迫中途停建。

大成从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短短八年中，不论在设备上、资金上都增加了八倍，这确是工业上“罕见的奇迹”（当时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氏对大成的评价）。因此可以说刘国钧接办大成是这个厂历史上的转折点。但回顾他在受盘时，一些殷实户都不肯投资支持，认为常州人刘柏森在上海办的宝成纱厂<sup>④</sup>已失败在前，钱琳叔办的常州纱厂还在无锡荣氏手中。因此对经营纱厂都已感到寒心。常州贫儿院院长冯晓青甚至还说：“如果再修县志，应劝人勿经营纱厂一语载入”，但是他都没有动摇信心。在事成以前，无锡唐星海还肯以十万元的代价向他转让，他也不肯同意。鉴于刘国钧有这样决心和魄力，大纶和久记的原股东顾吉生、吴镜渊、刘叔裴等都很支持；顾在成交时还说：“大纶原是常州人的，得之于常州，还之于常州，这是一件美事。”原创办人蒋盘发对刘的接办成功也感到十分高兴，在大成创办初期，蒋坐镇厂内协助管理。历史证明，大成由刘国钧的经营成功，确实为常州添加了新的光彩。

3.略后于“常州”、大纶两纱厂成立的还有福大和通成，但是这两个厂范围都比较小，并都是废纺厂，因此它们的遭遇比“常州”、大纶更坏。福大纱厂在办理不到二年就不幸遇火“夭折”。通成幸得存在到抗战，但前期也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中。值得一提的是，它是常州最早能生产六十英寸阔幅提花绒毯和军毯的一家工厂。

通成纱厂原名“利民纱厂”，于一九二二年由吴县张云搏、杨翼之创办，总股额为规元银一十万两。厂址在丁堰附近，距离震华电厂（今戚屯）不远，附近乡民好奇，统称这两个厂为“万物厂”。利民居西，又称“西厂”。开始时经理为张趾麟，设备有“走锭”五千二百枚，生产四支、六支粗纱，